

『通古察今』系列丛书

梁启超论中华民族精神

郑师渠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通古察今』系列丛书

梁启超论中华民族精神

郑师渠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启超论中华民族精神 / 郑师渠著.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9. 12

(“通古察今”系列丛书)

ISBN 978 - 7 - 215 - 12035 - 8

I. ①梁… II. ①郑… III. ①中华民族 - 民族精神 - 研究 IV. ①C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70910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 27 号 邮政编码:450016 电话:65788072)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5.75

字数 80 千字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2.00 元

“通古察今”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刘家和 瞿林东 郑师渠 晁福林

主 任 杨共乐

副主任 李 帆

委 员 (按姓氏拼音排序)

安 然 陈 涛 董立河 杜水生 郭家宏

侯树栋 黄国辉 姜海军 李 渊 刘林海

罗新慧 毛瑞方 宁 欣 庞冠群 吴 琼

张 皓 张建华 张 升 张 越 赵 贞

郑 林 周文玖

序 言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历史学科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业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是国家首批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单位，拥有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一系列学术平台，综合实力居全国高校历史学科前列。目前被列入国家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行列，正在向世界一流学科迈进。在教学方面，历史学院的课程改革、教材编纂、教书育人，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曾荣获国家教学改革成果一等奖。在科学研究方面，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出版了由白寿彝教授任总主编、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后，一批底蕴深厚、质量高超的学术论著相继问世，如八卷本《中国文化发展史》、二十卷本“中国古代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三卷本《清代理学史》、五卷本《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二十三卷本《陈垣全集》，

以及《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上博简〈诗论〉研究》等，这些著作皆声誉卓著，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得到同行普遍好评。

除上述著作外，历史学院的教师们潜心学术，以探索精神攻关，又陆续取得了众多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在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上连创佳绩，始终处在学科前沿。为了集中展示历史学院的这些探索性成果，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通古察今”系列丛书。丛书所收著作多以问题为导向，集中解决古今中外历史上值得关注的重要学术问题，篇幅虽小，然问题意识明显，学术视野尤为开阔。希冀它的出版，在促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更好发展的同时，为学术界乃至全社会贡献一批真正立得住的学术佳作。

当然，作为探索性的系列丛书，不成熟乃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学界同人不吝赐教。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通古察今”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9年1月

目 录

前 言 / 1

一、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精神论 / 3

(一) “民族精神”一词的缘起与梁启超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把握 / 4

(二) 民族主义、爱国与民族精神 / 17

(三) “中国魂安在乎” / 36

(四) 结语 / 47

二、梁启超的爱国论 / 50

(一) 从《说群》到《爱国论》 / 51

(二) 爱国与救国 / 60

(三) 爱国与“国民之自觉” / 71

(四) 结语 / 92

三、梁启超与欧战 / 96

(一) 从著书唤起国人对欧战的关注到巴黎和会的振臂
一呼 / 97

(二) 反省西方文明与揭出“中国人之自觉”的时代
课题 / 110

(三) 对晚年梁启超的再认识 / 124

四、欧战后梁启超的文化自觉 / 127

(一) 《欧游心影录》与“中国人之自觉”命题的提出 / 128

(二) 思想的“绝大之革命”：服膺反省现代性思潮 / 135

(三) 新文化主张的个性 / 143

(四) 文化自觉：战后国人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向度 / 163

主要参考文献 / 170

前 言

梁启超是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对许多问题的见解，尤其是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看法，不乏卓识，历久而弥新。强调爱国主义教育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是当今社会的热点。在近代史上，梁启超是最早揭出这一时代课题，并作了系统阐释的重要思想家。本书收入的《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精神论》《梁启超的爱国论》两篇文章，对其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考察与研究。不难看出，他的许多观点仍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加以借鉴。本书后两篇文章《梁启超与欧战》《欧战后梁启超的文化自觉》，从表面上看，似乎与前面的主题无涉，实则不然。晚年的梁启超曾被说成是在思想上走向了复辟倒退，由原本倡言学习西学，转而变成了反对西方文明，而力主传统文化；由一个主张革新者，

变成了一个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者。这实际是误读了梁启超。由上述两文所述，可以看出，以欧战为转变点，梁启超晚年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此种变化不是倒退反动，而是在重新审视中西文化的基础上，转进一层；尽管其中容有可商，但总体看，体现了任公自己所说的“中国人之文化自觉”。例如，他在1920年初考察战后欧洲归来发表的重要著作《欧游心影录》中说：“国是要爱的，不能拿顽固褊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又说：“要人人存一个尊重本国文化的诚意”，在借鉴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发展本民族的“一个新文化系统”，最终再以中华民族新文化去助益世界，“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以尽中华民族对于全人类的“责任”。不难理解，在此种全新的开放的视野与心胸的观照下，任公原有的爱国论与中华民族精神论，都随之展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光华。换言之，不理解欧战后世界之变化与任公思想之变迁，不足以与言其爱国论与中华民族精神论。四篇小文之初衷，仅一孔之见，尚祈读者批评。

一、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精神论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持续高涨，其核心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民族建国”，即建立独立的以宪政为基础的现代国家。与此相应，“民族”“民族主义”“民族精神”“现代国家”“爱国主义”等一套相应的话语系统也被引入了中国。梁启超既是近代中国这套话语系统最有力的创建者，他自然也成为了近代倡言民族主义最为有力的布道者。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精神论，实构成了其民族主义的逻辑起点与根本的思想基础。同时，他对于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概括，及其对于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的思考，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性意义。

(一) “民族精神”一词的缘起与梁启超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把握

“民族精神”一词，肇端于 18 世纪文化民族主义思潮日渐高涨的德意志。它指一个民族因历史文化诸因素形成的共同精神或禀赋。被认为是“‘文化民族主义’直接的启迪者”的德意志学者赫尔德，也是“民族精神”(Volkgeist) 意理的始作俑者。美国学者艾恺说：“在赫得(即赫尔德——引者)的思想上我们首次遇到了几乎所有文化民族主义意理——无论东方或西方——所共有的中心概念：‘国民精神’(Spirit of the people)，德文为‘Volkgeist’。”赫得以为，“不同种族首先由于地理与气候的特点开始分化，其后各自建立了不同的语言、文学、风习等等；乃至于是保有了个别的‘民族魂’”。^①英国哲学家罗素也指出：在 18、19

^① [美] 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4、25 页。作者在同页加注说：“赫得本人未用‘Volkgeist’一词，但他用了非常类似的词，如 *Genius desvolkes*, *Geist des Volkes* 等来表达 Volkgeist 一词日后所表示的意思。”

世纪的欧洲，随着民族国家的成长，各国维护民族精神的观念愈加自觉。特别是地处文化周边的国家，更强调吸纳外来文化必须接受本土精神的整合，建立国魂维护民族的独立与尊严。这种观念被概括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国魂”的原则，尤其在日耳曼民族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总原则。^①从赫尔德到费希特，德意志知识分子对“民族精神”的深刻阐发，不仅为实现德意志国家的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也为其后东西方的民族主义运动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民族精神”一词传入中国，固然最早始于1904年留日学生刊物《江苏》杂志上发表的《民族精神论》一文，但是，迄20世纪初，很少为人使用，时人更多的是使用“中国魂”“国魂”“国性”等词，以指称民族精神。因之，从严格意义上说，1899年梁启超发表的《中国魂安在乎》一文，当属国人最早揭出“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文字。他在该文中写道：

①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16页。

日本人之恒言，有所谓日本魂者，有所谓武士道者，又曰日本魂者何，武士道是也。日本之所以能立国维新，果以是也。吾因之以求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大索之于四百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伤哉！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吾为此惧。……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而将欲制造之，则不可无其药料与其机器。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①

很显然，在这里，所谓“中国魂”“国魂”，就是指中国的民族精神。尽管他说“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尚不免失之于狭；但他一针见血，强调“中国魂”的核心是“爱国心与自爱心”，却是十分深刻的。

其后，在不同的语境下，梁启超先后还使用了“中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2），中华书局1989年据1936年版影印，第38、39页。（以下出自同一书时不再标注主要责任者和出版年。）

国武士道”“国民之元气”“精神之精神”“根本之精神”“国民之精神”“民族的活精神”“民族精神”“独立之精神”“国性”“国民之特性”等概念来指称中国的民族精神，其表述也愈益完整。例如，1902年他在《新民说》中写道：“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齟然异于群族者，吾人所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①1912年梁启超在《庸言》上发表《国性篇》，这是他一生论述民族精神问题最为系统的一篇文章。梁启超在文中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国之所以与立者何？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国性。”国性之形成，缘于种族、地域、历史诸因素。“人类共栖于一地域中，缘血统之吻合，群交之渐磨，共同利害之密切，言语思想之感通，积之不知其几千百岁也，不知不识，而养成各种无形之信条，深入乎人心……熔冶全国民使

^① 《饮冰室合集·专集》(4)，第6页。

自为一体而示异于其他也”^①，故一国之语言、宗教与习俗，最能反映一国之“国性”。1915年，他在《大中华发刊辞》中再次谈到了“国性”：“国之成立，恃有国性。国性消失，则为自亡。剥夺人国之国性，则为亡人国。国之亡也，舍此二者无他途矣。国性之为物，耳不可得而闻，目不可得而见。其具象之约略可指者，则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以次衍为礼文法律，有以沟通全国人之德慧术智，使之相喻而相发，有以纲维全国人之情感受欲，使之相亲而相扶。”^②无论是强调“独立之精神”，还是强调“国性”，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的基本理路，梁启超是准确地把握住了。

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梁启超的概括，主要有五：

其一，道中庸，重和谐。梁启超称之为“我国民之中庸妥协性”。他指出：中国人无论是对于个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自然界，“最能为巧妙的顺应，务使本身与环境相妥协，而其妥协，且比较的常为‘合理的’。此中国人一种特别天才也”。缘是之故，与欧

① 《饮冰室合集·文集》(29)，第83、84页。

② 《饮冰室合集·文集》(33)，第83页。

人好走极端、讲绝对，因之种族、宗教纷争不已不同，中国强调“礼让为国”，即讲包容，道中庸，重和谐。“坐是其包容涵孕之力极大，若汪汪千顷之波，无所不受。”“故含纳种种民族、种种宗教，而皆相忘于江湖，未或齟齬破裂。”“其所最贵者厥惟秩序，务使其所包含之种种异质，与随时变化之环境相应，常处于有伦有脊的状态。”^①梁启超强调国人善于与环境（包括人际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相处，以追求“合理的”即中庸、包容、和谐的境界，他实际上是从哲学的层面上肯定了中国文化及其民族精神的核心乃在于“中和”。

其二，重统一与团结。梁启超强调，中国很早就开始了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春秋战国之交，是我们民族大混合大醇化时代”，“在这种时代之下，自然应该是民族的活精神尽情发露”。^②但此种统一，绝非“攘斥剿绝之谓，乃吸聚诸族，蜕变其原质，作为我族之一成分，而增廓其内容”，即表现为一种以汉民族为主体，多民族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

① 《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载《饮冰室合集·文集》（36），第31—32页。

② 《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载《饮冰室合集·文集》（38），第57页。